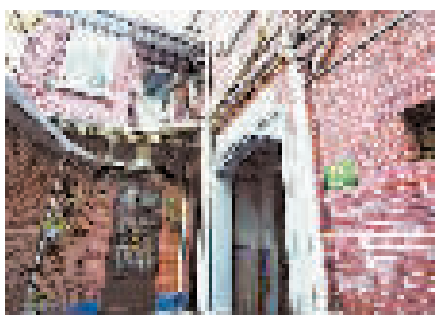


中央特科是个什么“科”



位于上海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的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资料图片)

入敌人心脏的“利刃”，科长为陈赓。情报科的主要工作方法是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打进去”“拉出来”战术，就是直指敌人要害，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周恩来认为“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进行考验”。1928年，中央特科“拉出来”争取到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人物——杨登瀛。“龙潭三杰”则是“打进去”的典范，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相互配合如一把利刃直插敌特机心脏，准确掌握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所有情报。顾顺章叛变时掌握着党中央和全体特科人员的情况，使党中央面临被毁灭的危险。因为钱壮飞及时得到了这一重要情报，才使党中央逃过这一重大劫难。

行动科以原武汉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特务科及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部分人员组成的红队（“打狗队”）为基础建立，主要负责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中央负责同志，营救被捕同志，保障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顺利进行。既是党在特殊时期的“执法队”，又是党中央的“护卫队”，科长为顾顺章，后由谭余保担任。以行动科为主执行的镇压叛徒何家兴、白鑫等行动，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交通科最后建立，不久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任务是研制无线电台，为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科长为李强、张沈川。1928年，中国共产党六大前后，各个地区陆续发生起义，根据地不断扩大，苏维埃政权不断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急需冲破重重围剿对各地红色区域进行领导。重要的文件从前都是靠交通员送，不但速度非常慢，而且非常不安全，中

中央特科创建至1931年4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不断完善，这一时期中央特科英才云集，汇集了陈赓、李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养山、刘鼎、陈寿昌等一大批隐蔽战线优秀代表人物，中央特科“十个第一”的光辉业绩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

第二时期是，1931年5月至1933年1月，中共中央撤离上海，中央特科开始整顿组织机构、重建对敌情报关系，代表人物是陈云、潘汉年和康生等，这一时期中央特科妥善处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事件，重建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的特科组织，在确保中央安全、惩凶除恶、力挫敌人阴谋、成功营救共产国际代表牛兰夫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时期是，1933年2月至1935年9月，在“左倾”思想和错误方针指导下，上海党中央、中央特科遭严重破坏，随着党中央撤离上海，中央特科解散，结束历史使命。这一时期代表人物为王世英、武胡景、卞惠安、刘仲华、邱吉夫等，惩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叛徒，营救了包括武胡景在内的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

在短短的8年间，中央特科建立了一张庞大复杂而全面高效的情报网，训练出一批忠诚的隐蔽战线革命英豪。他们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大量事关党中央生死存亡的敌情；设法营救出被敌人抓捕的任弼时、关向应、张浩（林育英）、刘晓等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严惩出卖罗亦农、李立三、彭湃等领导成员的内奸叛徒；白手起家，用血汗铸造了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特别是在1931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央特科以高效率粉碎了叛徒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一举破获中

共中央”的险恶阴谋，使党中央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绩。

永不磨灭的中央特科精神

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曾对中央特科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曾经说过，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1962年2月13日，罗瑞卿大将在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李克农的悼词中说，“他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1982年1月14日发出的一份文件指出：“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中央特科’，在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开展对敌斗争、惩办叛徒、获取情报、发展通讯联络工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中央特科虽然仅仅存在了8年，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最完善、最系统的情报部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它在与敌人的严酷斗争中形成的隐蔽斗争工作原则和方法影响深远，如“打进去”和“拉出来”相结合，情报工作和统一战线相结合，重视通信建设，深入群众，重视革命工作纪律和干部气节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防贪污腐化等，这些经验做法对今天的隐蔽战线工作仍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央特科甘居幕后、刻苦钻研、大胆探索、深入虎穴、不怕牺牲、危难时刻敢于力挽狂澜的精神，永远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今天仍然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无数无名战士。

魏安仁（摘自人民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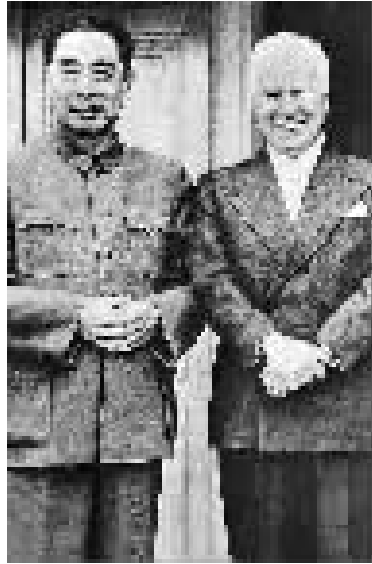


在他身边的时髦女子范瑞娟就是片中的“梁山伯”时，他后退两步，被“吓了一跳”，一边频频摇头、一边说：“不像，一点不像！”对于这个细节，范瑞娟回忆道：“那还是我第一次穿旗袍……卓别林说他怎么也想不到，片中那位敦厚朴实的中国书生竟然会是由一位女士扮演的，让他十分佩服！”

后来，卓别林又亲自到周总理在日内瓦的住处致谢。两人从政治到文化，从文化到艺术，从艺术到电影，谈得十分融洽。周总理的神采与气度，使这位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大师大为钦佩。

当卓别林辞别时，周总理也亲自送他出门，并在行辕门前与卓别林合影。在这张合影中，周总理与世界电影艺术大师肩并肩紧紧靠着站在一起，两人都发出由衷的微笑，放松、自然又亲切，倒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在一起合影，欢畅而随意。（摘自文汇网）

周恩来请看电影 卓别林感动落泪



周恩来与卓别林合影（资料图片）

对这位电影艺术家娴熟而巧妙的技能更为叹服。当他得知卓别林因从事进步电影文化受到



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1954)（资料图片）

美国反动势力迫害，不得不满怀愤慨家离开生活近四十年的美国，卜居于瑞士韦威镇的一个僻静小村庄后，特意邀请卓别林及其一家前来做客。

当得知中国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刚刚在捷克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电影节荣获音乐片奖，卓别林表示很想看看这部影片。

看完《梁祝》，卓别林很受感动，潸然泪下。卓别林发自内心地称赞：“这是一部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好片子。色彩好，演员更好，有表演天才。”

卓别林说范瑞娟有两处表演最动人：第一处是，当师母告诉他祝英台是女性而且很爱他的时候，范瑞娟听后的表情，就是完全不懂中国话的我，也能深深体会他内心的感受。第二处是梁山伯跑到祝家庄去求婚，祝家告诉他祝英台已许配马家，梁山伯听了之后，表情让人印象深刻。当周总理告诉卓别林，站

卓别林是二十世纪最引人瞩目的文化偶像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喜剧之王”。他塑造的流浪汉的形象，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成为电影史永恒的经典。

69年前，卓别林与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一段跨越大洋的友谊已经载入史册，然而历久弥新的感觉从未消失。

1954年夏，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举世闻名的日内瓦会议，下榻于景色秀丽的日内瓦莱蒙湖畔。当时就在这所普通的白色老建筑里，周总理与世界影坛巨星查利·卓别林有过一次亲切而愉快的会见。尽管随着岁月流逝，两位巨人都已相继谢世，但他们之间的诚挚交往和深厚友情，却长驻人间广为传颂。

早在本世纪初卓别林的喜剧短片刚刚传入中国时，周恩来就曾观赏过，对这位具有卓越才能的电影艺术大师的印象十分深刻。在这次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有机会又一次看到卓别林的《城市之光》，